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经史关系史

汪高鑫 著

黄山书社

中国经史关系史

ZHONGGUO JINGSHI GUANXISHI

汪高鑫 著

黄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史关系史 / 汪高鑫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12
ISBN 978-7-5461-5993-5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经学-关系-史学-中国
IV. ①Z126.27②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1831 号

责任编辑 张向奎 代立媛
装帧设计 钱志刚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500 千
印 张 18.5
书 号 ISBN 978-7-5461-5993-5
定 价 8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节 经与史的产生及经史之学的流变	002
一、经与史的产生	002
二、经史之学的流变	008
第二节 经史因缘与晚清经史之学的转向	015
一、流变中的经史因缘	016
二、晚清经史之学的转向	020
第一章 “六经”的史籍属性与历史思维	027
第一节 “六经”的形成及其史籍属性	028
一、“六经”的形成过程	028
二、“六经”的史籍属性	032
第二节 “六经”的历史思维	038
一、通变的历史思维	038
二、忧患的历史思维	046
三、以史为鉴的历史思维	050

四、以史为法的历史思维	055
五、天命王权的历史思维	061
第二章 汉代经学的兴起与史学的崇经意识	066
第一节 经学的兴起与史学的“成一家之言”	066
一、“独尊儒术”与汉代经学的兴起	067
二、“成一家之言”与汉代史学的发展	076
三、经史开始分离与史学的崇经意识	083
第二节 今文经学与司马迁史学	088
一、今文经学的天人观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088
二、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097
三、今文经学的“大一统”之义与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106
第三节 今古文经学与班固史学	113
一、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与班固史学	114
二、刘歆的古文经学与班固史学	124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玄化与史学的玄化倾向	136
第一节 玄学背景下经史之学的尚玄与崇经	137
一、经学的衰落与玄学的兴起	137
二、史学的发展与多途性特点	142

三、经史之学的“贱经尚道”与“宗经征圣”	146
第二节 玄学化史学的人物品评	152
一、玄学的人物品评风气	153
二、史学的人物品评	155
第三节 玄学化史学的历史评论	163
一、玄学化史学历史评论的表现	163
二、玄学化史学历史评论的特点	165
第四章 唐代经史总结与疑古惑经中的经史关系	177
第一节 唐代的经史总结与疑古惑经思潮	177
一、唐代前期的经史总结	178
二、疑古惑经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185
第二节 唐代经史总结背景下的经史关系	190
一、经史总结中经学与史学的密切联系	190
二、经史总结中经学与史学的相互作用	193
第三节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下的经史关系	200
一、刘知幾的以史疑经	200
二、新《春秋》学派以褒贬之义疑《春秋》“三传”	207
三、新《春秋》学派与唐中后期史学变革	212
第五章 宋元经学的理学化思潮与史学的义理化倾向	218
第一节 经史关系视野下的宋代经学理学化	218

一、经学的理学化过程	219
二、理学化经学体系的建构	229
三、史学怀疑精神与传统经学历史考证原则的破除	245
第二节 宋元历史思想的义理化倾向	258
一、“会归一理”的历史盛衰观	259
二、由神意化转向哲理化的天人观念	267
三、功业与道德兼顾的正统观念	275
第三节 宋元史学思想的义理化倾向	284
一、义理化史学的劝惩与鉴戒功能	284
二、经学理学化与史书体裁的变化和创新	291
三、《春秋》笔法的盛行	297
四、求真理念：义理与史实兼具	306
 第六章 明代经学由理学向心学转变与史学的新变化	315
第一节 明代前期理学的衰微与史学的停滞	316
一、理学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	316
二、理学影响下明代前期史学的萎靡	323
第二节 心学思潮的兴起与中晚明史学的崛起	339
一、心学思潮的兴起	339
二、心学影响下中晚明史学的崛起	348
第三节 史学对明代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影响	396
一、史学与明代程朱理学的存续	396

二、史学对阳明心学的影响	402
第七章 清前中期经史之学嬗变中的经史关系	409
第一节 清初实学思潮下的经史关系	409
一、清初实学思潮的兴盛	410
二、黄宗羲的兼综百家与尊经重史	417
三、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与考据实证	429
四、王夫之的“理不离气”与历史评论	438
第二节 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与考证史学	446
一、乾嘉考据学兴起的原因	447
二、乾嘉考据学的思想与方法	451
三、乾嘉考据学背景下的史学考证	463
第三节 经史变革过程中的经史关系论	476
一、常州今文经学的援经议政	476
二、乾嘉史学的变革及其经学特色	482
三、乾嘉经史关系论的新发展	492
第八章 晚清经史之学的转向与新史学的出现	502
第一节 救亡图存背景下的晚清经史之学	502
一、倡导变革:晚清经学的进步主张	503
二、救亡图存:晚清史学经世致用的主题	515
第二节 今文经学的新史学转向	528

一、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与晚清经史之学的转向	528
二、晚清今文经学向近代新史学转变的过程	537
第三节 古文经学改造经学为史学	550
一、章太炎改造古文经学为史学	550
二、刘师培对构建新史学的贡献	561
主要参考书目	569
后 记	583

绪 论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经学在两千年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一直是作为官方学术思想与统治意识形态,对其他学术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使得中国古代学术被明显打上了经学的烙印;中国又是一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度,史学非常发达,人们通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中国古代繁富的史籍。

相比较于其他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经史之间的因缘最深,相互影响最大。从学术源头来讲,经与史具有同源性,先秦“六经”中的《尚书》《春秋》既是经书,也是史书,为传统史学之源;而《诗经》是史诗,“三礼”叙制度沿革,《周易》具有丰富的历史思维,对传统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就治学特点而言,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过程中,经史之学相互影响,经学以史证经、史学以经解史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节 经与史的产生及经史之学的流变

经与经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是指儒家经典,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①产生于先秦时期;经学是指研究儒家经典而形成的学术思想,这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兴起的,并且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史学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并且留下了大量官私史籍;然史学独立则自司马迁始,此后的两千年传统史学也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与流变过程中。

一、经与史的产生

经与史皆产生于先秦时期。经最初是一种纺织工艺概念,以后逐渐演化为对官府与诸子典籍的称呼,“六经”则是诸经中最受推崇者;“史”最初的含义指史官,后来才具有史籍的含义。本书所谓的经与史,当然是指先秦的经籍与史籍。

作为后世儒家经典专称的经,在先秦时期它的含义有一个演变和发展过程。“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金文,其本义按照《说文解

① 关于“六经”排序,今古文经学不尽相同。今文家的排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家的排序则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今文家排序依据的是经典阅读的难易程度,古文家排序依据的则是经典出现的时间先后。本书罗列“六经”按照今文家顺序,而论述“六经”思想则以经典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

字》的说法是,“经,织从丝也”^①。清人段玉裁注曰:“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②因而经的本义乃指编织的纵丝,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古老纺织工艺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经开始用来指称官府和诸子百家的基本典籍,如《释名·释典艺》所谓“经,径也,常典也”,像《墨子》的《经》《经说》,《管子》的《经言》《解》等。作为典籍的经,在这一时期并不局限于只是对儒家经典的指称。不过,在这一时期能够得到普遍尊崇的经典,还数《诗》《书》《礼》《乐》《易》《春秋》。把这六部经典并称为“六经”,始见于战国文献《庄子》中的《天运》篇^③。此外,像《庄子·天下》《商君书·农战》和《荀子·儒效》等篇亦有记载。近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称此“六经”为“六德”,而且排序如同《庄子·天运》^④,更是打消了人们对于战国时期是否存在“六经”的疑虑。但是,在《庄子》一书看来,“六经”只是有关古圣先贤的经籍,是诸家皆称引的天下道术,而非某一家专有之物^⑤。

“六经”后来之所以逐渐演变为儒家学派的基本经典,追根求源,还是与孔子对它的整理和传习有密切关系。孔子开创私学传授“六经”,其实是沿袭了周代官学教育的传统。《周礼·天官》

① “从丝”二字原文脱,清人段玉裁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六补。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

③ 《庄子·天运》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见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④ 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六德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⑤ 《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见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云“儒以道得民”，郑玄注说：“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这里所谓的“六艺”，其实包含礼、乐、射、御、书、数之小“六艺”和《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大“六艺”，前者为六种技能，后者为六种书籍，反映了周代贵族教育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大“六艺”又称“太艺”，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六经”经典。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反映了孔子私学教育的内容、规模与成就。《汉书·艺文志》也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说明儒家群体所受的教育内容即“六经”文献。

孔子在传授“六经”的过程中，并非只是照本宣科；为使“六经”成为便于教导学生的教材，孔子一定下了一番整理的功夫，因而“六经”是凝结了孔子的心血于其中的。对于孔子整理“六经”的情况，司马迁作如是说：“《书传》、《礼记》自孔氏”，“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因史记作《春秋》”^①。虽然后世学者认

^①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为这些说法是受董仲舒今文经学观点影响的结果^①,然而说法本身的正确性也是不能给予简单否定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证明。其一,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司马迁如此言之凿凿地肯定孔子整理“六经”,绝不可能认为这是子虚乌有的说法,何况历史上肯定孔子整理“六经”依然是一种主流观点。其二,孔子以“六经”为教材,出于教学的需要对教材本身做适当的整理与编订,完全在情理之中。诚如周予同所言:“孔子为了讲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六经”“无疑经过孔子整理,也因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②。其三,如果没有孔子对于“六经”的积极宣讲,加上孔子后学的积极传习,“六经”就不可能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也就不可能在后来经学兴起之后得到普遍推崇。

当然,后世儒家基本经典,还有一个从先秦“六经”到汉代“五经”,再到唐代“十二经”,最后到宋明“十三经”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汉代设“五经”博士,其“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没有《乐经》。关于《乐经》的亡佚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认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贍养之。”(苏舆义证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司马迁《史记》说孔子与“六经”,确实受到了今文学家董仲舒的影响。随着此后今古文的纷争,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代学者众说不一。周予同以清末皮锡瑞和钱玄同作为两种极端的观点加以对举,认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一书“极力主张‘五经’都是孔子的著作”,而钱玄同的《重论今古文问题》一文则“完全否定孔子与‘六经’有关系”。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6—797页。

②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1页、802页。

为亡于秦火；一是认为“乐”本无经，只是附于《诗经》的乐谱。不过，近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已有与《庄子》所记完全相同的“六经”之名，可以证明后一说法并不正确。到了唐代后期，儒家“五经”已扩大为“十二经”，除了《易》《书》《诗》三经外，《礼》分《仪礼》《礼记》《周礼》三种，《春秋》有《公羊》《穀梁》和《左传》“三传”，外加《论语》《孝经》和《尔雅》。宋明时期，随着孟子儒学地位的提高，又增添了《孟子》一书，于是有了“十三经”之说。不过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一直是其中的核心经典。而这些基本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封建时代里，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先秦时期的“史”字出现很早，最初的含义是指史官，赋予其史籍之义则是较晚的事情。白寿彝先生说：“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①关于史乃史官之义，前贤已有详论^②，此不赘言。而古人何时赋予史以史籍之义，史界则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所谓“吾犹及史之阙文”，《孟子·离娄下》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中的“史”应该是指史籍^③。不过，秦汉时期人们通常是以“史记”来称呼史籍，如司马谈就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④这里所谓“史记放绝”，显然是指《春秋》问世以来的400年间再也没有记载历史的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②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等。

③ 学术界也有认为此二处“史”字，仍是指史官。《四书章句集注》的作者即持此观点，参见《孟子集注·离娄下》注文。

④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史籍出现。

当然,我们这里的关注点并不是古人什么时候赋予了“史”字以史籍的含义,而是先秦时期的史籍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最初的史籍又有哪些,后来的历史撰述又有何成就。从逻辑上说,有了史官,便有了历史记录。《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所谓“册”“典”,便是商代史官记录下的历史文献资料。实际上在春秋以前,由于学在官府,大凡典章故事和礼法度数,皆为官司所守,而这些内容,都是一种历史记录。像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①,申叔时所谓“故志、训典”^②等,这些典籍虽然不足考,却恐怕都是春秋以前史官留下的重要史料。不过,史官们留下的历史记载,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史籍,而且先秦史官记录下的史料之史,虽然数量庞大,却早已散佚。留存至今的可以被称作史籍的先秦之史,则始于“六经”的撰述。金毓黻先生按照章学诚的记注与撰述两分法,将先秦历史记载分为史料和史籍两类,肯定先秦“史官所掌,属于史料之类,即章氏所谓记注也”,明确提出先秦史籍始于《尚书》和《春秋》,“故惟认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③。“六经”之后的先秦代表性的史籍,还有《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和《战国策》等。其中《左传》和《国语》都是反映春秋时期历史的史籍,《左传》是一部体裁比较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对于古老的编年叙事方法有重要发展;《国语》是一部分国记言的史书,在记言中包含作者的政治与历史见解于其中。《世

① 《左传·昭公十二年》,杨伯峻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国语·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0页、28页。